



▲天星小輪載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標誌的旗幟在維港航行。 新華社

立即捲起袖子

第六屆特區政府新班子集體亮相與媒體見面，筆者正與幾個朋友在一起吃飯，大家一邊看直播一邊評頭論足，望着電視機屏幕上新班子正在拍大合照，我第一感覺是「有隊型」：候任行政長官連同新一屆政府的六名正副司長、十五名局長，加上特首辦主任，以及警務處長、入境處長、海關關長和廉政專員、審計署長，這份由中央任命的管治團隊名單，是回歸以來歷屆管治班子陣容最大，所有男高官清一色藍領帶，女高官都是白色外套或白襯衫，紀律部隊出身的候任行政長官和他的團隊一出場，果然不同。

仔細分析新班子成員的背景，不僅有政務官、專業人士、業界精英，亦有多名紀律部隊出身的司局長，值得一提的是，回歸以來首次有現任立法會議員加入管治班子，而且是三人同時由監督者「華麗轉身」成為被監督的問責官員，還有一人出任審計署長。新型的立法行政關係可見一斑，剛剛當選議員半年，出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的香港大學教授孫東，更是管治團隊首名操普通話、出生北京的「海歸」，也許他可以帶動整個官場普通話水平的提升呢。新班子的組合有突破有新意，成員多元、文武兼備、新舊搭配，印證李家超在組班時所強調的原則：不論什麼背景，只注重經驗、能力和理念。

受疫情等原因影響，李家超當選之後着手組班的時間比較短，而且班子人數比歷屆多，能夠順利組建一個具說服力的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固然是李家超的管治理念具吸引力，相信更重要的是所謂「熱廚房」時代已成過去，完善選舉制度之後，議事堂不再是反對派恣意妄為的政治舞台，添馬艦皆是愛國者的身影。在過去半年，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施政效率大幅提升，因此更多賢能之士願意投身服務社會、貢獻才幹。

香港回歸二十五年經歷風風雨雨，特別是二〇一九年「修例風波」，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充分暴露、各種政治勢力浮上檯面，「一國兩制」和國家安全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整個社會遭受前所未有的傷害，迫使中央打出一套「組合拳」，成功扭轉局勢，香港由亂到治。作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煥然一新，等待李家超及其管治團隊的，是一個由治及興的重要歷史契機。

但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一點不比以往任何一屆特區政府輕鬆，甚至可以說更具挑戰性。一方面社會撕裂嚴重，人才流失嚴重，這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面對的挑戰，這個問題不解決，香港就難言發展。另一方面，國際地緣政治環境急劇變化，國際局勢

非常複雜，美英等西方勢力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對包括李家超在內多名特區政府現任和候任官員實施所謂制裁，意圖透過打擊香港詆毀「一國兩制」，達至圍堵中國的目的。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也許，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擁有豐富的警隊指揮經驗和行政管理經驗的李家超正可以大展身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筆者最喜歡聽李家超說的一句話，就是「解決問題」，他在上京領取委任狀和接受領導人接見之後，

曾經對傳媒說過：「問題很多，但每天解決一個，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個，積累下來就應該有成績了。」無論修補社會撕裂、重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和對未來的信心，還是解決房屋問題告別劊房，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而社會充滿焦慮，缺乏耐心。「一國兩制」新時代的藍圖已繪，時不我待，最重要是行動，特區新班子陣容鼎盛兵強馬壯，要立即捲起袖子，用實幹做實事，盡快用「結果」去贏得社會信心、爭取民心。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我與大公報

我在大公報的成長

馬玲

大公報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在天津創刊，創刊之初，就以「敢言」著稱。

一九二六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組成新報公司接辦大公報。大公報以文人辦報的方式重新登場，推出辦報新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言」。

大公報在創刊的一百二十年中，從天津到上海，抗戰期間又經歷了漢口、桂林、重慶，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復刊。大公報是至今尚存的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

我仍清晰記得第一天進大公報工作的情况。那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的早春，上班第一天，我被安排去參加有關北京申辦奧運會的新聞發布會。回到首都賓館的辦公室後，詢問稿件怎麼寫，大公報北京辦事處主任鞏雙印讓我看了一下樣稿。我看後一驚，需要豎着寫，而且是繁體字！

我嘗試着寫完稿後，通過傳真發去了香港。

第二天，我從家中搬來「四通2403」打印機（當時記者都沒電腦），稿件寫完後稍加編輯，豎版繁體字就輕鬆發去了香港。隨後，受到編輯部表揚，因為有些記者的「手書」實在難以辨認。

進大公報沒幾天，我見到了從香港來北京參加「兩會」的總編輯曾德成。他叮囑，要盡量挖掘獨家新聞，這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後來我能在大公報發出一些具影響力的獨家新聞，有些被路透社、美聯社和法新社等通訊社轉發，與總編輯曾德成最初的激勵密不可分。

入職的當年秋天，我從北京去大公報香港總部實習了一個月。在香港受到新聞氛圍的感染，回京後開始思考如何把北京的優勢發揮到最大化。後來和報社領導討論商議，大公報於一九九四年推出了「華人政要」人物專題報道，主要採寫中華人民共和國部級以上的領導，每周一個人物，專門開出一個整版登載，「首開

了寫政治人物」的先河，所以「往中南海跑」也成了我那時的一個「新常态」。

後來，我找到總政宣傳部，希望與他們合作開設介紹中國軍事發展的欄目。總政宣傳部召集在京的各兵種宣傳處長開了個座談會，指示他們為大公報的「軍事之窗」欄目提供幫助。這個欄目，也是周一整版。此外，還邀請了張召忠和金一南出任大公報的特約撰稿人，我那時已感受到金一南的非同一般之筆。

當時的大公報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延軍非常豁達，為我的工作提供了諸多方便和支持。

一九九六年底，我去大公報香港總部工作，並參加了九七回歸慶典採訪，在現場親眼目睹了回歸交接儀式的整個過程並撰寫了回歸稿件。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五年，大公報協助中央電視台製作了被立為國家項目的回歸紀錄片《香港滄桑》，我的作用是從中穿針引線。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回首當年往事，可謂不甚感慨。

從寫時事到寫歷史，我的報道篇幅也有了縱深感。當初，我投身大公報，正是因為看中了它的那份歷史厚重。它的「文人辦報」氣質，它辦報的「四不」風骨，對我有著強烈的魅力吸引。

我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紅牆內外的獨家報道》一書，記錄了自己在大公報第一個五年的步履和思考，沒想到還成了那年的一本「小暢銷書」。

在大公報當記者期間，不僅可廣泛涉獵地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採訪報道，而且報館還給了我追隨報道中央領導人出訪的機會，踏足亞洲、歐洲、非洲以及中東地區，力使報道和評論能夠更深入。

二〇〇〇年的新世紀開端，新一任總編輯楊祖坤（前任總編輯曾德成已進入香港特區政府班底），希望

我能在大公報要聞版開設「馬玲專欄」，對每日的時事進行評論。這是個極大的挑戰，之前的大公報雖然很重視評論，但是尚沒有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時事專欄。考慮一番，我接受了。於是，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開始，「馬玲專欄」推出。

光陰荏苒，大公報迎來了創刊一百二十周年。歷史上的大公報是名副其實的記者培養搖籃，產生過許多名記者，包括張季鸞、王芸生、范長江、楊剛、彭子岡、徐鑄成、蕭乾等等。

當年的大公報，有不少沐浴過洋風的「西派」人物，所以大公報有個籃球隊也就不足為奇了。一九四八年，以「大公報籃球隊」為班底組建的中國籃球隊（十名隊員中其中六位是大公報人），出征倫敦第十八屆奧運會，戰績不俗，先後擊敗了比利時、韓國、伊拉克等國家隊，可謂開闢了中國奧運史的新紀元。

金庸和梁羽生都曾是三公報人，後來又都成了新派「武俠小說大師」。

費彝民當了近四十年的香港大公報社長，一生為大公報貢獻良多，被尊稱為「費公」。他一九四八年隨大公報赴港直到一九八八年仙逝，其間作為北京與海外的最重要「聯絡員」，先後與周恩來總理會面五十多次。大公報當年率先報道了中央政府決定收回香港的決定。大公報是海外了解中國動向的主要媒介。

一九八〇年大公報要成立駐京辦。八十年代中期首都賓館竣工，成為繼北京飯店後國家全資擁有的第二家五星級酒店。大公報北京辦事處就設立在此。

在我作為記者的成長之路上，大公報給予了我很多養分，讓我至今受用，所以我一直懷著深深的感恩之心。願一百二十歲的大公報扎扎實實走下去，在記載歷史的同時也成為歷史的一個傳奇。

大公報前高級記者

宋韻視野下的龍泉青瓷



市井萬象

「宋韻視野下的龍泉青瓷」古今對比展現正於浙江省博物館舉行。是次展覽集中了浙江省博物館、遂寧市博物館、義烏市博物館等機構館藏的重要文物，並納入當代龍泉青瓷作者的作品，展示宋韻文化和青瓷技藝的傳承。

圖為展覽陳列的一套宋式點茶器皿。

新華社



柏林愛樂團開放日

作為柏林愛樂團的忠實粉絲，我們自然不會錯過愛樂廳一年一度的開放日，就連兒子也毫不猶豫地取消了他和小夥伴的乒乓球局。是的，這真是一場大人和小孩都喜愛的「音樂嘉年華」。

說是嘉年華，彷彿有點匹配不上「優雅又端莊的」柏林愛樂團。然而，當你看到平日身着演出正裝的音樂家們在這一天換上便裝，參與到和兒童青少年們的互動活動中時，便能理解這個「嘉年華」還真是名副其實。

整個開放日活動在柏林愛樂廳和緊鄰的樂器博物館舉行，室內的部份包括各種形式的音樂演奏會、樂器大師班、講解參觀團，室外還有樂隊、合唱團表演……看累了餓了還有提供豐富多樣餐食的室外燒烤酒吧和愛樂團餐廳。

作為開場，柏林愛樂團請出了團裏的「十二把大提琴」進行開場表演。因為整個演出都會通過在線音樂廳現場直播，首席大提琴師幽默地對着鏡頭和觀眾們道「早安」「午安」和「晚安」。他們演奏的曲目相對往日更加的輕鬆歡快又「平易近人」。而聽眾席上也不像正式演出的音樂會那樣嚴格地要求安靜，時而有小孩走



柏林漫言 余逾

來走去，時而傳來嬰兒的哭聲，在輕快的大提琴聲中，感覺這些聲音竟然能跟音樂和諧地融為一體。

開場音樂會結束後，在小型音樂廳裏立刻開始了一組由柏林愛樂團下屬卡拉揚學院學員演奏的室內音樂會。兩位小提琴手，一個中提琴，一個大提琴，站在中間的是吹單簧管的小伙子，他們分別來自加拿大、韓國、列支敦士登等五個不同的國家。他們演奏的是莫扎特的一首單簧管五重奏。五位年輕的音樂家在台上充滿了熱情，他們默契十足合作得緊密無間。時而小提琴領銜，時而單簧管領奏，他們相互用琴聲和眼神交流，完美地呈現了這首莫扎特的名曲。

整個開放日的重頭戲必須是下午四點和六點由柏林愛樂團現任首席指揮基里爾·別特連科指揮的Sinigaglia和Schulhoff的兩個曲目，還有首席小提琴家Noah Bendix-Balgley擔當了其中的獨奏。熱情的觀眾們提前半個小時便在門口排隊等候，進場時每人都會領到一張有座位號的音樂會門票對號入座。演出還有十分鐘才開場時，場內已經座無虛席。

整個音樂會的氣氛輕鬆又愉快，比往日略顯嘈雜的觀眾席一點也不影響音樂家們一絲不苟地演出。最後響起的掌聲和歡呼聲，也比音樂季裏的現場更加熱烈一些。

音樂廳的其他場地裏，有專業的樂器專家給小孩們講解樂器製作，選用簡單的道具讓每個小孩都可以製作出自己的小圓號，可以發聲的那種哦。再小一點的小孩期待滿滿地等候在化妝區，等着在臉上手上被「塗鴉」，畫上各種樂器的樣子。而年紀大一點樂樂器的青少年學生們也不失時機地參與到各種「大師班」，與台上的音樂大師們「平起平坐」「交流」琴技。

這真是一場音樂的盛宴，九歲到九十九歲都能在這裏感受到音樂帶來的快樂。



▲卡拉揚學院的學員演奏莫扎特作品。 作者供圖

我的恩師



人與事

魯力

福建師範大學的孫紹振教授是我的博士導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總想為恩師生日寫點什麼。在我進入大學學習時，孫紹振已是在全國有名氣的教授了。用一位同學的話說，當年在我們心裏，「孫紹振就是神一樣的人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在全國引起熱議，也讓老孫成為矚目人物。這篇文章現在已成為當代文學史的重要歷史文獻，其手稿已被現代文學館收藏。孫教授把康德的審美價值論引入文學創作領域，提出「真善美三維錯位」獨特的系統理論。他在幽默學方面也頗有建

樹，提出「幽默邏輯錯位」獨創理論。在散文方面，他提出了「審美、審醜與審智」的散文理論體系。在中國文學評論界，老孫與北大的謝冕教授有「南孫北謝」之稱。

幾十年來，孫老師每年都收博士生，還堅持給中文系本科生上課。他主編的初中語文課標實驗教材，在七個省市使用了十幾年。他牽頭進行的兩岸合編教材項目，歷時五年完成三十多本一千多萬字合編教材的編寫，部分教材曾在台灣的中學使用。他曾被評為省級「優秀教師」，獲國務院津貼專家等榮譽。現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等高校的一些領軍人物，一些全國知名的媒體人、作家、詩人等，不少都是老孫的學生。

近兩年來疫情肆虐，我曾因商務返

內地七次，在酒店隔離就想起不如跟孫老師學學寫散文。我經常打電話、發微信「騷擾」孫老師，而他總會不厭其煩，給我指點批評。除了來讀書，我順便也來讀下孫老師。「一個多才多藝的寫作者，一個神采飛揚的演說家，一個生動有趣的教授，一個永恆活力與創造力的智者。」孫老師今年八十六歲，但他仍思維敏捷，言語犀利，文思泉湧，評論、散文、詩歌等新作不斷，著述之書也一本本在出版。老孫行動上更如年輕人。他的自信不僅來源於學養淵博，更源自於良好身體。

「奇怪得很，我每年的體檢都查不出有什麼毛病？各個器官都很好。」老孫的話讓我羨慕。孫老師最近還被福建師大返聘，還承擔任了國家級研究課題，成為全國在職年齡最大的教授。